

养老中国

## “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出台 健康老龄化“两先两综合”

文/李佳



作者为盘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两会前夕,围绕全社会普遍关注的人口老龄化,一系列政策文件密集出台。继《“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于2月21日发布后,《“十四五”健康老龄化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又于3月1日出炉。

健康是老龄群体继续美好生活的基础条件,更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促进健康老龄化,能够协同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做得好可能得到“双倍奖励”,做得差可能造成“双倍损失”。因此,《规划》值得我们给予“双倍关注”。

围绕发展目标,《规划》提出,到2025年,老年健康服务资源配置更加合理,综合连续、覆盖城乡的老年健康服务体系基本建立,老年健康保障制度更加健全,老年人健康生活的社会环境更加友善,老年人健康需求得到更好满足,老年人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健康预期寿命不断延长。

《规划》还提出了七项工作指标和九项任务。

老年人中医药健康管理率达到75%以上;五是60%以上的二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设立老年医学科;六是85%以上的综合性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成为老年友善医疗卫生机构;七是85%以上三级中医医院设置康复(医学)科。

九项任务包括:一是强化健康教育,提高老年人主动健康能力;二是完善身心健康并重的预防保健服务体系;三是以连续性服务为重点,提升老年医疗服务水平;四是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体系;五是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六是发展中医药老年健康服务;七是加强老年健康服务机构建设;八是提升老年健康服务能力;九是促进健康老龄化的科技和产业发展。

那么,以上发展目标、工作指标和任务的制订背景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十四五”期间,我国的人口老龄化还会发生哪些变化呢?

一是人口老龄化加速,由快速老龄化阶段进入急速老龄化阶段。2022年起,随着1962年-

1976年第二次出生高峰人口步入老龄阶段,我国老龄人口将迎来第二个增长高峰,年均增加60岁以上老龄人口数量逾千万。

二是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加深,由轻度老龄社会进入中度老龄社会。2021年末,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0056万人,占总人口的14.2%。这是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首次突破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14%。以此为标志,我国已经从2000年的轻度老龄社会步入中度老龄社会。“十四五”末期,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3亿,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0%。

三是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加剧。2021年末,我国人口数较上年末增加仅48万人,创1962年以来新低。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零人口增长波动期”,即将开始人口负增长。同时,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开始进入70岁、80岁的中高龄,老人护理的“高峰”正在到来,并将持续存在构成“高原”。

四是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与机遇并存,“新老人”进入老龄期。2020年起,60后开始陆续步

入60岁老龄期。与40后和50后相比,60后的寿命更长,健康意识更强,收入更多,受教育程度更高,生活预期更丰富。这些新的特征,使60后成为了不同于前一代的老龄群体。他们有着更强的购买力,也有着更强的购买愿望、要求和动机。

正为了应对这些变化,《规划》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可以归纳为“两先两综合”。

一是教育为先。对健康的关注和追求,必然是人一种自发、自愿、自觉的行为。因此,健康知识和技能的普及,是推动健康老龄化的第一要务。《规划》将强化健康教育排在各项任务之首,提出要拓展老年健康教育内容、形成多元化老年健康教育服务供给格局、创新老年健康教育服务提供方式,实施老年健康教育专项工程。

二是预防为先。由“治已病”向“治未病”转变,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如何治未病?就是要做好身体和心理上的预防。《规划》提出,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促进老年人健康

的能力,完善老年人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开展老年人心理关爱服务,推进体卫融合,实施老年预防保健专项工程,从日常锻炼、体检、评估、管理、指导等各个环节提出了具体要求。

三是综合治病。我国78%以上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种以上慢性病,如何帮助这些老人在带病状态下更长时间地保持现有状态,需要综合、连续、协同、规范的医疗服务和康复护理服务,现在越来越细分的诊疗体系必然难以胜任。《规划》提出,要增强老年疾病诊治能力,加强康复和护理服务,发展安宁疗护服务,创新连续性服务模式,实施安宁疗护服务发展专项工程。

四是综合照护。《规划》提出,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失能老年人照护服务体系。一方面,社区和机构要支持家庭照护;另一方面,促进机构照护服务发展。《规划》继续推动基层医疗机构拓展养老服务,提出“在有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增设护理床位或护理单元”。

自由谈

## 破除有形的“35岁门槛”,更要改变无形的年龄焦虑

文/朱昌俊



作者为媒体评论员

减少就业市场中一刀切的年龄限制很有必要,但破除人们心中的年龄焦虑,和对社会构筑在年龄之上的功利化认知,其实更重要。

国人口平均年龄已达到38.8岁,相比20年前足足提高了六七岁。这时35岁的年龄上限已经大大低于社会平均年龄。这意味着更多人被排除在公务员考试资格之外了。

此外,2011年,我国社会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5年,到2020年,已经提高到10.8年,“十四五”时期还将继续提高至11.3年。这一趋势下,如果还是沿用35岁门槛,一个人从毕业到考公务员的过渡期就将越来越短,且不说加剧了过度竞争,也不利于提升公务员考试选拔的质量。

事实上,在一个年龄结构越来越“老化”的世界,社会年龄的重新定义正在成为一种趋势。比如,流传很广的一个说法是,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确定的年龄分段规则是——青年人:18岁至65岁;中年人:66岁至79岁;老年人:80岁至99岁。这一信息的真实性仍待核实,但从整个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和预期寿命的不断提升看,已经延续了很多年的公务员招录35岁年龄上限,越来越与社会现实脱节是显而易见的。它既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也不可避免地强化社会的年龄焦虑。

当然,完全取消公务员招录年龄限制或并不实际,也无必

要。比如,它将增加选拔的成本,同时也可能让更多人把精力耗在公务员考试上,这未必是好事。但是,告别一刀切的年龄要求,适当放宽年龄上限,同时根据不同岗位要求精准划分年龄门槛,这是完全可以做到,也能够做好的。其实,很多国家也是采取这种相对弹性的方式来设置公务员的年龄限制。

不过,公务员招录年龄限制的放松并不是难事,更难的或是在经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口红利期后,如何推动社会构建更开放、公平的年龄观、就业观,告别畸形的“年轻崇拜”,打造全龄友好型的就业环境。

众所周知,35岁门槛并不仅仅存在于公务员招录中,而是大部分行业都或明或暗存在的一道就业“金线”。比如,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在互联网企业,35岁+就会面临被优化。其他领域的职称评定、内部选聘等,也都倾向于仿照公务员招录年龄限制,把35岁作为一个重要的年龄筛选标准。甚至一些城市的房地产调控,也明确规定35岁以上的

购房者不能算为刚需。这一普遍做法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其科学性又体现在哪里,目前无法给出确切的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就业公平、人才资源的最大化利用等,的确形成一定程度的抵牾。

不过,将它完全视为年龄歧视,又似乎并不充分。首先,它的确离不开时代的现实背景。比如,在互联网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对年轻的推崇甚至崇拜,确实是一种“流行病”,它默认只有“年轻人”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所以也就有了“5岁就是一代人”、“1992年老阿姨”等说法。此外,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步伐不断加速所制造的“速度崇拜”,夹杂着对于经验主义的反感,也让“年轻就是王道”的观念深入人心。

其次,它也未尝不是功利主义大流行的一个现实注脚。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细节是,我们这个社会早已看不到或者自动忽视“大器晚成”的现象。前不久去世的著名媒体人曹景行被称为业界难得一见的“白发记者”,

这寄托着外界对他个人坚持的一种赞赏,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白发记者”之所以少见,除了个人、行业原因,也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年龄“挤压”效应有关。因为几乎在所有行业,什么年龄达到什么级别,升到哪个职务,乃至什么年龄该有房,该开什么车,都有一套默认的社会预期,而达不到的,就被视为异类、失败者。显然,这一社会观念的形成,并不完全是35岁的年龄上限所带来的。相反,不少行业一刀切的年龄要求,很可能只是这种功利化的“成功观”的产物。

因此可以说,减少就业市场中一刀切的年龄限制很有必要,但破除人们心中的年龄焦虑,和对社会构筑在年龄之上的功利化认知,其实更重要。它需要有形的、不合理的年龄限制被破除来推动,也还有赖于社会全方位的减压,来培育从容的社会心态。无论如何,当担心年龄增大“跟不上时代的步伐”,担心自己因为“超龄”而被淘汰,成为一种主流的焦虑,这是不正常的。

核心话题

## 奢侈品行业为何率先复苏?

文/范欣



作者为财经评论员

当一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上升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奢侈品市场的消费就不再由所有居民收入增速水平左右,而主要是由高收入阶层居民收入增速决定。

这样分析的主要问题在于,奢侈品市场的兴起确实与居民收入水平直接相关,但当一国居民整体收入水平上升到中等收入阶段后,奢侈品市场的消费就不再由所有居民收入增速水平左右,

而主要是由高收入阶层居民收入增速决定。疫情虽对大部分居民收入增速造成显著影响,但对高收入阶层收入增速影响非常小,甚至还增加了高收入阶层居民收入水平。

众所周知,疫情出现后各国为了减小其对经济的冲击,纷纷采取了较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直接从疫情前的4.1万亿美元升至如今的近9万亿美元,市场流动性极为宽松,欧国家直接把名义利率降至0,实际利率则降为负数。市场无风险利率为2%时,对应无风险资产的市盈率可以到50倍,当无风险利率降至1%时,对应无风险资产市盈率则可以升至100倍,而无风险利率降至负数后,市盈率则会失去定价基础,进一步催生资产价格上涨。2020年和2021年欧美国家主要股市都迎来了较为强劲上涨,表现较为突出的纳斯达克指数2020年上涨了43.6%,2021年上涨了22.1%。不仅股市,发达国家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强劲反弹,美

国房地产市场景气指数已经超过了疫情前,创历史新高水平。

资产价格上涨最为受益的无疑是高收入阶层,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疫情期间美国人储蓄了约3.7万亿美元,其中70%是由20%的高收入阶层贡献,原因就在于高收入阶层在市场利率下降之时可以动用杠杆推动资产价格上涨,从而形成超额回报。回顾历史,每轮危机爆发后,多数国家都会选择用扩张性货币政策予以对冲,对应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均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资产价格也会出现大幅上涨,这点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也有明显的反映。

相反,低收入阶层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于劳动报酬收入,且发达国家普遍去工业化,大量就业都依靠一般服务业,而一般服务业的工资水平不仅因劳动力供给较大而难以快速上涨,还受每轮危机冲击较大。由此带来贫富差距水平在疫情暴发后不仅没有缩小反而会快速拉大,高收入阶层在疫情期间收入的快速

增加无疑会增大对奢侈品的需求,这也解释了为何奢侈品行业会先于实体经济快速复苏。从某种角度而言,当经济发展至中等收入水平后,奢侈品行业在某个阶段突然的爆发式增长与贫富差距水平的拉大有很强的相关性。

而且,在奢侈品行业,还有一部分奢侈品如名表兼具投资属性,其走势变动与金融市场上其他资产如虚拟货币、股票等高度相关,且厂商饥饿营销的手段很容易造成二级流通市场上层层囤货,最终形成价格泡沫,其本质与近几年炒鞋、炒盲盒没有本质性区别。

对我国而言,奢侈品行业目前仍处于快速发展期,疫情对奢侈品行业的影响只在于暴发初期,随着严格防疫政策的落地,正常的经济秩序得以恢复,奢侈品市场也逐渐回暖。更何况由于出境游因疫情影响仍未放开,很多购买需求转至国内释放,三亚2021年离岛免税销售额高达361亿元,同比增长了74.8%,这

也带动国内奢侈品市场先于发达国家快速升温。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奢侈品行业仍将保持稳步发展的态势,贝恩公司的报告预测按照当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在2025年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全球市场份额预计超过25%,超过欧美在全球的市场份额。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发达国家逐步放松疫情防控政策,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逐渐减弱,全球奢侈品市场也将延续回暖态势。同时,由于美联储已经进入加息缩表周期,美国实际利率水平正在稳步抬升,也就是说市场上便宜钱在减少,对应资产价格将会出现调整,年初至今全球主要国家股市已经完成了一轮调整,一些具备资产属性的奢侈品经过前一段时间的爆炒后价格处于高位,所以未来一段时间这些奢侈品的价格可能出现一轮较大幅度的回调。更需注意的是,奢侈品行业短时间内突然爆发式增长可以作为观察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指标。